

窺視中國

美國情報機構眼中的 紅色對手

參與文件定稿的經常有以下重要成員：美國國務院情報和研究署署長、陸軍部負責情報的助理參謀長、海軍部負責海軍行動（情報）的助理參謀長、空軍司令部負責情報的助理參謀長、聯合參謀部情報局長、美國情報局駐原子能委員會代表、特種作戰部的助理國防部長、國家安全局局長、聯邦調查局助理局長。因此，這些文件應該被看作是美國情報部門和精英集體研究的成果。

沈志華 梁志 / 主編

沈志华 梁志 / 主编

窺覗中國

美國情報機構眼中的
紅色對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窥视中国：美国情报机构眼中的红色对手 / 沈志华，
梁志主编.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1. 1

ISBN 978 - 7 - 5473 - 0276 - 7

I. ① 窥… II. ①沈… ②梁… III. ①中国—现代史—
史料 IV. ①K27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18750 号

窥视中国——美国情报机构眼中的红色对手

出版发行：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 话：021 - 62417400

邮政编码：200336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昆山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10 × 1020 毫米 1/16

字 数：335 千

印 张：25.25

插 页：3

印 数：0,001—4,000

版 次：2011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473 - 0276 - 7

定 价：40.00 元

目 录

一、窥视“红色中国”：美国中央情报局对新中国的总体 认知	华东师范大学 沈志华	1
1. 中国将向何处去？		2
2. 政治运作、政权稳定性与毛泽东		4
3. 进步神速但依旧明显落后的经济		9
4. 军事实力与“对外侵略”的可能性		16
5. 从反帝到反帝反修的外交政策		23
二、无所作为：美国情报工作在中国内战中的失落	华东师范大学 杨奎松	33
1. 战后美国对外情报工作的停滞		33
2. 战后初期美国在华情报工作的困境		36
3. 美国国务院相关情报的内容及其价值		39
4. 中央情报局的情报分析报告及其价值		51
5. 美国对华情报及其分析评估的失落		57
三、透过竹幕看中国：美国情报机构对中国内政的 窥探	东北师范大学 张民军	62
1. 建国之初的政治运动与社会状况		63
2. 政权机构的调整与政权的稳定性		69
3. 民众的态度及社会控制		74
4. 中国的经济政策及发展趋势		78

四、第三只眼：对中国经济的精准判断与深刻分析

..... 华南师范大学 姚昱 85

1. 中国国内经济 86

2. 中国与不发达国家的经济联系 102

五、管中窥龙：美国情报部门对中国尖端武器计划的

评估 东北师范大学 詹欣 112

1. 中国第一次核试验：是钚还是铀？ 112

2. 中国核武器计划：孰先孰后？ 115

3. 中国导弹计划：仿制还是自行研制？ 118

4. 中国核潜艇计划：“毛级”潜艇是核动力吗？ 129

5. 中国太空计划：令人困惑的发射时间 133

六、迷雾中的红色异邦：美国情报评估视野中的中国

外交 武汉大学 徐友珍 141

1. 美国情报界对中国外交走向的追踪与预测 142

2. 美国情报界对中国外交的关注焦点及基本结论 159

3. 美国对华外交评估的特点与误区 173

七、台海风云起：美国情报官员的视角

..... 复旦大学 双惊华 180

1. 美国对台湾的政策 183

2. 台湾当局对美国的政策 192

3. “国际地位”及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 197

4. 关于“反攻大陆”的问题 203

5. 对大陆台海政策的认知 213

6. 美国对台湾的援助 222

7. 对台湾岛内情况的评估 228

八、乱世迷局：“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中国

..... 华南师范大学 何慧 236

1. 探秘寻踪——如何收集有关中国的情报 236

2. 迷雾中的身影——中国高层领导人	238
3. 浑水中无鱼——政治、经济与社会秩序	247
4. 坚定与彷徨——对外政策及其困境	252
5. 破解迷局——情报评估与分析报告的价值	254
九、中情局的聚焦镜下：中苏关系将向何处去？	
.....	北京大学 何妍 260
1. 雾里看花——1949～1953年	261
2. 如胶似漆——1954～1957年	266
3. 积重难返——1958～1960年	271
4. 破镜难圆——1961～1969年	276
十、透过铁幕观“铁板”：中情局眼中的“东方阵营”	
.....	北京大学 郭洁 280
1. 中苏结盟与合作时期	280
2. 中苏分歧与争论时期	284
3. 中苏关系走向彻底破裂时期	293
十一、中间地带的冷战：对华情报中的第三世界	
.....	北京大学 牛可 刘青 299
1. 中国在亚洲的政策和影响力	303
2. 中国在拉美拓展影响	309
3. 中国在非洲的外交和援助活动	312
4. 关于“人民外交”	315
5. 中苏分裂在第三世界的体现	316
6. 一些具体情报分析中的有趣内容	320
十二、置若罔闻：对中国出兵朝鲜的情报评估一错	
再错	东北师范大学 邓峰 325
1. 美国的信号情报侦察	325
2. 美国的空中拍照侦察	329
3. 美国的人力情报侦察	332

窥视中国：美国情报机构眼中的红色对手

4. 对苏联支配下中国出兵可能性的评估	336
5. 对中国参与战争的意图及能力的评估	339
6. 对中国公开警告的错误判断	342
7. 中国出兵后美国的情报评估	346
8. 美国情报评估失误的主要原因	352
十三、伺机行动：中情局如何看中国出兵印度支那	
..... 南开大学 赵学功	362
1. 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	362
2. 美国酝酿扩大战争	366
3. 越南战争的升级	370
4. 美国扩大在东南亚的行动	375
5. 几点评论	377
十四、世界屋脊的冷战：中印关系和南亚局势	
..... 华东师范大学 戴超武	380
1. 尼赫鲁的中立主义与印度独立初期的外交政策	382
2. 中印关系、西藏问题和中印边界冲突	384
3. 现代化与印巴两国的经济发展问题	389
4. 克什米尔问题、印巴矛盾与 1965 年印巴战争	390
5. 1971 年印巴战争和孟加拉国的成立	394

一、窥视“红色中国”：美国中央情报局对新中国的总体认知

华东师范大学 沈志华

1947年,为了遏制苏联及其领导下的国际共产主义力量,美国构建了举国一致的国家安全体制,其组成部分之一便是中央情报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与中苏同盟的缔结令美国决策者惊慌失措,“红色中国”成为中央情报局密切关注的对象。

从1954年开始,中央情报局几乎每一至两年都要对其所收集的对华情报做一次综合性评估,并预测未来几年中国的发展趋势。这些文件反映了中情局乃至美国主要情报机构对中国政策取向及发展趋势的最终认识和判断,而这种认识和判断往往是在其他专门评估报告的基础上归纳、提炼或升华而来,因此显得更为重要而不可替代。

显示这些文件重要性的还在于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这些文件虽然都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提交的,但参与评估的情报组织不仅有中央情报局,往往还有国务院、陆海空三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原子能委员会的情报部门,并且最后得到了美国情报委员会的赞同。而参与文件定稿的经常有以下重要成员:美国国务院情报与研究司司长、陆军部负责情报的助理参谋长、海军部负责海军行动(情报)的助理参谋长、空军司令部负责情报的助理参谋长、参谋长联席会议情报室主任、美国情报局驻原子能委员会代表、特种作战部的助理国防部长、国家安全局局长、联邦调查局助理局长。因此,这些文件应该被看作是美国情报部门和精英集体研究的成果。

1. 中国将向何处去？

对于朝鲜战争后中国发展趋势的总体评估，中央情报局首先着眼于判断中共领导人的目标和理想。

1954年6月的报告认定：“中国共产党人的长远目标是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自身经济军事实力基础、在东亚和南亚占据统治地位的苏联模式的国家。”为此，“他们将继续逐步扩大经济中的国有部门，削减和抑制私营企业，并建立大型合作式和集体式农庄。他们仍将最优先考虑基础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中共政权也将投入大量资源加强其武装力量的现代化，作为执行其外交政策的实力基础”。

1956年1月的报告认为：“中共政权决心把农业占主导的经济转变成苏联模式的工业化国家”，“在东亚消除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影响和势力，取得控制权”，“对台湾和其他他们认为传统意义上属于中国的地方建立起控制”，并“作为世界上一个主要大国获得认可”。中国的总体目标是“促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

1960年12月的报告指出，由于“在过去11年中，共产党中国在工业、军事力量、对人民的组织和管理上都取得了突出成就”，并受到“共产主义的理想主义和中国的民族主义这种复杂的心理鼓舞”，中共领导人“决心尽快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占领导地位的世界强国”，并将“加速共产主义的建设”。

从这三个时间段的报告可以看出，在中情局眼中，到1960年代，中国未来目标的特点集中在三个方面：“苏联模式”、“共产主义”、“占有领导地位的世界强国”。这无疑表明，在国家发展目标的设定上，中国就是美国在冷战环境下和意识形态上的敌人，并早晚会成为其全球竞争的潜在对手。

在对中国实际地位进行不间断地评判时，中央情报局发现，在中共掌握政权后的十年间，中国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接近其所设定的目标。

到1956年初，中情局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在中国大陆牢固地确立了他们的控制，并且正干劲十足地沿着苏联模式的路线尝试改造经济制度、社会制度，建设军事力量。在苏联的帮助下，武装力量得到极大地增强并在很大程

度上得以现代化了，经济产量大部分都达到或超过了战前的峰值。由于其成就和蒸蒸日上的国力，共产党中国在亚洲的威望和影响已经大大地增加了。”1957年3月的报告认定：“在过去的七年里，中国共产党人有效控制了中国大陆地区并建立了一个与苏联结盟且敌视美国的强大中央政府”，“彻底改变了中国社会的许多基本特质”。因而，“中国在非共产世界的影响力有了显著提高，在亚洲尤其能感受其力量的存在”。

中情局在1959年7月断定：经过“大跃进”运动，尽管中国国力还远远低于美国，但是，“在其执政的第十个年头，中国共产党人已牢牢地控制了中国大陆，国家经济飞速增长，共产党中国在世界事务中的分量也不断上升”。到1960年底，中国的经济发展开始进入了一个特殊的困难时期。这时，中情局官员们的认识是：虽然“面临着一些最严重的问题”，但“中国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同时在军事力量上也保持稳定增强，这使得该政权更接近实现其主要世界强国的目标”。显然，对于中国发展速度的这种判断，相应地决定了美国把中国设定为主要或危险敌人这一思考进程的速度。

在这个判断的基础上，美国情报部门对中国未来5~10年的发展预测是：“到1965年，无论共产党中国是否是联合国会员，它都将实实在在地成为世界主要强国之一。”“北京的政策会处于相对平和的方式和彻底的强硬态度之间，但是对美国强烈的仇恨以及渴望推动共产主义世界革命的情绪仍然会在北京的外交政策中占主导地位。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共产党的傲慢和自负也会成为苏联的一个主要担忧。同时共产党中国给美国的利益带来的危险，特别是在亚洲地区还会增长。”到1971年，在中共控制下的中国将拥有8.5亿的人口，继续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常备军和军事储备。煤、钢、电力的产量可能跻身世界前三位，但“质量、多样性和生产的技术水平仍然明显低于日本、苏联和西方工业化国家”。无论如何，那时的中国仍将显示出“冷酷、坚定、统一并对美国有着根深蒂固的敌意”，其“作为世界主要权力中心之一的地位将会大大加强”。

如果说从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对立的角度出发，美国情报部门有意无意地过分突出了其潜在对手的发展，那么在对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进行预测时，他们还是保持了比较冷静和客观的态度。在中国经济发生困难的第三个年头，中情局分析官员对情况的判断已经没有那么肯定了，他们认为：“未来中国

共产党的走向主要取决于三个不可预测的变数：领导人的智慧和现实性；农业生产的水平；对外经济关系的性质和范围。在过去的几年中，这三个变数全都不利于中国。1958年领导人发起了一系列错误的、极端的经济和社会改革；1959年是三个歉收年景的头一年；1960年苏联停止了绝大部分的经济与技术援助。这三个因素共同造成了国家经济的混乱。越来越多的人营养不良，对外贸易下降，工业生产和发展急剧下滑。现在还看不出该政权的经济状况有马上恢复的迹象。”

俗话说：“旁观者清。”应该承认，中情局对于造成中国三年经济困难的原因，进行了十分到位的分析。不仅对这三个因素的概括是全面的、客观的，而且其排列顺序也非常合理：人祸第一，天灾第二，外来因素第三。更重要的是，这三个变数，特别是第一项，确实对以后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困难时期，中共领导人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对国家发展采取了一种比较务实的政策。这一点，美国人也是看在眼里的。1963年5月的评估报告指出，中国的“国内形势似乎有些许改善”。不过，报告也预言，“在未来的五年内”，“荒谬的教条主义政策、恶劣的天气以及其他不利因素综合起来将会导致彻底的经济停滞”。前景究竟如何，“一个关键的问题是，中共领导人是否会在面临强大的意识形态冲动的情况下保持一种务实的路线”。后来的历史进程不幸被中央情报局言中：在“意识形态冲动”下发生的“文化大革命”，确实把中国带入了一个相对来说“经济停滞”的发展期。

2. 政治运作、政权稳定性与毛泽东

在政治方面，美国情报分析专家主要集中讨论的三个问题是：政治体制的形成及其特点，政权的稳定性和社会控制，国家领导人现状和继承人问题。

关于中国的政治体制，中情局在1950年代的几个评估报告中确定了两个特点：第一是高度集权，第二是党政合一。1954年6月报告就指出：“中共已经对苏联式行政及政治方面的制度和管理技术加以改造以适应中国的条件”，并且“强行建立了一套垂直管辖至村一级的统一的政体结构”；“中国的根本权

力属于共产党并被授权给党的中央委员会政治局”，而政治局的主要成员也都是行政机关的领导人，并且从中央到地方都是这样一种“党政一体”的模式。此后不久，6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撤销大行政区一级行政机构，同时合并若干省、市建制。于是，1956年1月中情局的报告说：中国政府“最近进行了改组，控制权进一步集中到北京”。还说，中国共产党“统治和控制着政府机构”，尽管缺乏关于党内权力分配的情报，但“党的主席毛泽东的至高无上似乎是绝对的。毛既是党的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主席，也是政府的正式首脑”。一年后，评估报告又写道：政府被中国共产党完全掌控，国家和地方大部分重要的政府职位都由中共党员担任。从中央到下面最小的行政区，都设立了与政府组织机构平行的中共党组织机构。北京的指令从政府和党两条渠道下达。

或许是考虑到中共在中国政治体制中这种特殊的地位，在1960年代初期的评估中，已经不再讨论国家体制问题，而集中分析党的情况了。中情局认为，中共为保证党的活力而采取了不断发展新党员的做法。1949年以后，党员队伍不断膨胀，到1960年底已经达到1600万人，比苏联还多400万人，“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为了解决党内矛盾，树立党的绝对权威和统一性，中国采取了两种措施：一是“更新纪律措施”，针对党内不同意见开展批评运动——1959年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运动就是典型；一是通过开展学习毛泽东著作选读本的运动大力推崇“毛的意识形态”，为“‘毛个人崇拜’潮流注入新的动力”。党的活力就是国家的活力，党的团结就是国家的团结，党的制度就是国家的制度，这一点，中情局看得很清楚。

对于中共政权稳定性的考察，始终是中情局评估报告不可或缺的内容，其结论是：尽管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和困难，这个政权一直都是稳固的。

中情局的报告指出：“1949年，该政权面临着普遍的经济崩溃，面临着12年实际上不间断战争造成的普遍困顿。”就是面对如此严重的障碍，“共产党人进行了大规模的政治及社会变革，他们基本上清除了有效的反抗。他们极大地恢复了国家经济并对之建立起控制”。在1955~1956年的“社会主义过渡阶段”，面对巨大的阻力，中共一方面借助苏联的经验，另一方面根据自己的经验，运用“松紧结合”的策略，通过“党对权力的垄断和国家对经济关键部位的直接控制”，对“中国传统社会体系”进行了改造，并摧毁了他们眼中的敌对势

力“可能具有的凝聚力和独立领导能力”。在 1956~1957 年，尽管合作化运动引起了农民的不满，反右派运动打击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超速度的改造也造成了国内普遍的压力和紧张”，但是，这“还没有发展到威胁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危险程度，对生产的阻碍也没有发展到限制中国经济进一步增长的严重程度”；“我们相信中共有能力继续牢固和有效地控制中国大陆。党的领导人继续显示了内聚力和决断力，同时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灵活性”。

至于保证国家稳定和社会控制的手段，中情局认为中共采取了镇压和宣传相结合的方针。除了“一系列镇压运动”，中共还通过“一个大规模高度协调的宣传机构”，“竭力向人民灌输一种加入‘新中国’的感受”，“激励国人的民族自豪感”。美国人也注意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控制手段：“中共政权拥有大量训练有素的警察、民兵和安全机构，同时辅以告密者网络和对单独家庭进行监督的地方‘居民委员会’。党的控制通过社会和职业两条线建立的群众组织系统得到进一步加强。这种群众组织系统负责动员支持共产主义纲领的居民各类团体，同时也是进行宣传和教化的渠道。”因此，“民间不同政见和几乎不可避免会爆发的地方不满都不会威胁到中共政权的生存或者其对大陆地区的控制力”。说中国民间有“告密者网络”不免言过其实，但所说“居民委员会”确是看到了中国社会的独到之处。

到 1960 年，“大跃进”造成的混乱和危急已经显露，人民公社的许多激进措施也被迫放弃。与此同时，党的领导层“也有着明显的不同看法”（庐山会议）。这时中情局认为，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面对不得不肩负的沉重负担引发的不满和对事实的觉醒可能会有所加强”，中共政权也“将面临越来越多的问题，需要解决公众的冷漠、疲劳和消极抵制”。但是，“共产党中国在对人民的管理和领导人的自信心方面，总体上还是表现出显著的能力”。除了通常的统治手段，在中情局看来，这一时期能够保证稳定局面的因素还有以下几点：党的领导人采取各种措施避免特殊化和脱离群众，如干部下放劳动（连毛泽东也去参加集体劳动）；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建立起民兵制度，这支拥有 2.2 亿人、“分布广泛的民兵的主要任务显而易见是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取代判刑定罪和送入劳改营，对于思想的教育和批判已经成为形成“社会压力”的“主要手段”。因此，人们“对政权依然是拥护的，他们中很多人对共产党中国迅速成为一个世界强国感到骄傲”。“在任何情况下，我们目前都看不到对政权的延

续存在着什么严重的威胁，无论在党内还是在党外。”甚至在经历了三年经济困难的严重危机之后，尽管看到中共政权面临着种种困难，中情局依然认为这种局势不会“恶化到在不久的将来引发突如其来的、大规模的抵制”。相反，由于最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北京领导人的自信心增强了”，“他们相信通过这些磨炼他们已经确立了政权的合法性”。

总的说，这些看法还是比较客观的。不过，这里有一个问题似乎需要提及，即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与中国历史上大多数农民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传统一样，当时中国民众的不满，主要是针对基层干部的，而对于党和政府，特别是毛泽东本人，广大人民还是衷心拥护并寄予极大希望的，因此才有“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一哄而起的壮观景象，才有调整时期经济迅速恢复的良好局面。这一点，中情局分析官员大概没有留心，或者根本就没有想到。

评估报告反复提到的另一个看法是值得引起注意的，即以高压手段保证社会稳定的长期效果问题。无论是镇压还是灌输，对于解决社会矛盾和平息社会不满，都属于一种压制性措施，而这种措施的长期效果是值得怀疑的。中情局 1954 年的报告谈到，由于“压制措施已经在许多人群中造成了恐惧气氛”，“1949 年中共政权所获得的发自内心的最大支持已经消散了”。尽管恐惧和不满未必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多数人的心态，但随着时间推移，这一现象迟早会出现，特别是在社会精英和知识分子中间。在那场横扫全国的反右运动以后，中情局预测，“由于意识到中共政权的力量，并明白没有选择的余地，大多数中国人会继续默许共产党的统治”。到 1960 年底，评估报告的说法是：那些工作过度、食不果腹、苦不堪言的中国人对中共政权的态度，用“最恰当说法就是顺从”。沉默和顺从不是没有意见，不是没有不满，只是在高压的手段下没有表露出来。任何国家，任何社会制度，都有其内在的社会矛盾，甚至冲突。一个“世界主要强国”成功崛起的标志之一，就是具有在体制内随时化解这些矛盾和冲突的能力，而不是通过压制把它们积留下来。除了必要的镇压和强制，解决社会问题的主要途径应该是疏导，通过相应的机制和渠道把那些不利于国家稳定的因素和能量释放出来，并引上正确方向——促使有关机构正视社会问题和民间呼声。从这一点看，“文革”前中国的社会稳定中确含有不稳定因素——1966 年突然爆发的社会大动乱固然有种种原因，但宣泄积留已久的不满情绪恐怕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评估报告用大量篇幅讨论了中国权力核心的动态，其中特别是对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及其所引起的继承人问题的预测。对于一个被认为是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这种关心是必然的，也是可以想见的。

在 1954 年的报告中，中情局认为：“中国领导阶层显示出党内精英的内聚力和稳定性。共产党领导人通过自 1921 年共产党成立以来他们在革命战争中的共同经历而紧密团结在一起。”尽管“高饶事件”的发生说明“分歧与竞争的存在，并暗示在刘少奇和周恩来周围存在着不明帮派”，但并无确凿证据证实实际上层梯队内明显组建了派系”。即使该年 61 岁的毛泽东因“身体状况欠佳”而“退休或去世”，但无论是“共同掌权式的接班”，还是由刘少奇或周恩来作为继任者，都不会严重影响“中共政权管理和控制中国的能力”。

1956 年 1 月的报告指出，“由于毛现在 63 岁了，并可能健康状况欠佳，毛的接班人问题将变得重要起来”。而在“毛去世的情况下”，因为在中共领导层没有任何人“拥有绝对权威的地位”，中情局认为，中共“可能会努力建立某种形式的集体领导”。同时，因为刘和周“在重大政策上所表达的观点并没有冲突之处”，所以他们及其他领导人之间的分工和不同背景“似乎更可能成为贯彻已同意过的政策的互补力量，而不是严重冲突的根源”。

中共八大召开以后，中情局对于中共领导核心的分析和评论就更加详细了。首先可以肯定的是，“中共最高领导层仍持续显示出其显著的持续性、统一性和稳定性”，而“毛的个人威望和影响力并未因苏联对‘个人崇拜’的抨击而减弱”。引起情报官员注意的是，中共中央委员会增加的 103 名委员和候补委员，这说明“中共高层机构增加了新鲜血液”。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个人提升就是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他在 13 位原政治局成员中很明显是年纪最轻的，却进入了政治局常委会”。评估报告再次谈到继承人的问题：“如果毛泽东去世或失去能力”，很可能出现的情况是由朱德接替毛泽东的国家领导人的位置，而实际权力由集体领导班子掌握。尽管可能出现权力之争并降低政策的灵活性，“但不会威胁到中共政权控制国家的能力”。

1959 年初毛泽东宣布辞去国家主席一职，在西方引起了广泛猜测。中情局经过分析认为，虽然在一系列政策方针上党内都存在着分歧意见，但“毛泽东的决定不是党内有任何反对他领导的意见而促动的，而是像官方宣布的，他希望集中精力去解决政策问题和共产主义理论问题。作为党的主席，他仍是

国家的一号人物”。其理由是，“如果党内出现一个打算排挤毛的集团，按照逻辑应先把毛从党主席的位置上撤掉，保留国家主席来维持他的公众威望和象征意义”。但是，对于毛以后的情况，这时的估计就比较严重了：“毛的缺位可能会导致共产党的办事效率、活力及其在共产主义世界的声望下降”，而且“党内可能出现分裂”。

庐山会议以及随后开展的党内反右倾运动使美国情报官员认识到，“虽然在过去的三年间党内一直持续着激烈的争论”，但“总体而言党的领导层并没有被激烈的党派之争所困扰，毛似乎继续控制着党及其制定的政策。毛的权威以及来自党领导层中其他很多成员的积极拥护，使得毛的观点可能仍占主导地位，而且党派之争在他有生之年将不会成为严重的问题”。即使毛泽东去世——鉴于毛当时 66 岁，中情局认为他可能在几年内去世，暂时出现的集体领导结构也会使党内的有关政策的激烈争论趋于相互妥协，而总体上不会引起中共的共产主义政策和统治能力出现基本的变化。1963 年 5 月的报告进一步指出，“政权仍然被掌控在长征老同志那一小圈人手里”，而且“最后的权力仍然在毛泽东手里”。但是，这个领导团体“存在着一个日益严峻的问题——他们中几乎所有人都已经 60 多岁或 70 多岁了。毛泽东今年就要 70 岁了”。

中情局官员们之所以一直盯住毛泽东的年龄不放，并不断讨论毛以后的权力继承问题，就是因为他们认为，越到晚年，毛泽东对权力抓得越紧，中共对国家权力的掌控正在从党的集权转向个人集权。所以，对于中国政治问题的分析和讨论最后集中到这一点。

3. 进步神速但依旧明显落后的经济

对于中国 1950 年代的经济发展，中央情报局最基本的判断是：取得了惊人的成就，面临着严重的问题，与世界主要大国相比还处于落后的水平。

1954 年的报告指出：“尽管共产党人在恢复中国经济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基本模式却原封未动。农业生产仍是主要活动，人均产量仍低下。”中国当时的国民生产总值大约 270 亿美元，“不到苏联的三分之一，差不多也就

是美国的十四分之一”，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 54 美元，“大致与印度相当，但只不过是日本的四分之一”。“即使到了 1957 年，共产党人也才刚刚开始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就整体而言，中国仍将以农业为主，并且是欠发达的。”

1956 年的报告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只是最近才设法应付在创建社会主义国有经济过程中出现的根本性问题，就算得益于苏联的经验教训，这些问题也将是难于解决的。”报告预计：“从 1952 年到 1960 年，共产党中国将可能使发电量增长大约三倍，煤炭产量翻番有余，并将其机械工业产值增加大约二倍半。然而，即使有这些重大进展，共产党中国的工业基础仍将是薄弱的。”

一年以后，中情局承认，“在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开始的四年里，中共政权在其工业化计划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很大的发展。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年增长率可能已经达到 7%~8%，这个增长率堪与近几年日本的增长速度相比，且大大地超过了亚洲其他国家”。其原因在于，“中国大陆地区的政治统一使中国近百年来第一次有了一个基本和平的环境，使中共政权能够整合此前停滞的经济、组织资源并在全国基础上进行生产”。

虽然认识到中共的目标“过于乐观”，也看到“大跃进”运动会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严重问题，但中情局还是对此后的发展趋势还是做出了过于乐观的估计：“我们相信共产党中国有能力使其 1959 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 12%~15%，在余下的三年里，即在 1960~1962 年，也能成功地维持每年 7%~10% 的增长速度。这些增长可能会使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1958~1962)的国民生产总值总体增长 65%~85%。”具体地讲，1962 年国民生产总值可能达到 650 亿~670 亿美元，谷物 2.15 亿吨，棉花 200 万吨。看来，“大跃进”时轰轰烈烈的场面和层层加码的汇报数字，不仅使中国人头脑发热，也把美国情报官员搞晕了。

1960 年底的情报评估又恢复到比较冷静的状态：在继续得到社会主义国家“设备和技术援助”的情况下，未来五年内中国的“年均国民生产总值将保持 10%~11% 的增长率”。到 1965 年，中国“在煤炭领域可能会居世界领先地位，在粗钢生产上居世界第三位，在电力生产上占主要地位，而且在海运、机械上的地位将有显著上升”。虽然取得可以这些成功，但是中国“想要成为一个现代化工业大国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因为中国的基础毕竟太差，“1959 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为 120 美元左右，或者只有日本的四分之一左右”，“工业